

一代宗師 深切懷念朱德熙先生

項夢冰
語文出版社



朱德熙，江蘇省蘇州市人，生於1920年10月24日。1939年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1940年轉入中文系，中間休學兩年，1945年畢業。曾從唐蘭學習古文字學。1946年起在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1952年去保加利亞索非亞大學任教，1955年回國後一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歷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系主任兼現代漢語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會長、北京市語言學會副會長、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理事、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1979年出席巴黎第十二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並在巴黎講學。1986年出訪歐洲，在法國獲頒授名譽博士學位。1989年6月11日到美國西雅圖(Seattle)、斯坦福(Stanford)等地從事講學和漢語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1992年7月19日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醫院因肺癌逝世，享年七十二歲。

朱德熙先生長期從事現代漢語語法和古文字研究，在語文教育、寫作及修辭方面也有不少著述。50年代初，朱先生跟呂叔湘先生合著的《語法修辭講話》在《人民日報》上連載，在全國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1956年發表的《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被趙元任先生譽為同類研究中最好的一篇(見Yuen Ren Chao,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朱先生在其後發表的《說「的」》等一系列語法論文中，都顯示出嚴謹、深入而多創見的特點，並且十分重視語法理論和分析方法的探索。他提出的一些理論觀點對推動漢語語法研究產生了重要的作用，主要有：劃分詞類祇能根據詞的語法功能；漢語詞類跟句法成分之間不存在簡單的一一對應關係，漢語句子的構造原則跟詞組的構造原則基本一致，漢語語法學應以詞組為本位；指稱和陳述；自指和轉指；嚴格鑒別語料；研究現代漢語語法應當上溯到近代漢語和古代漢語，並橫聯其他方言。朱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面也有重大成就。除在戰國文字（特別是銅器銘文）的字形考釋方面有所創獲外，還注重古文字在句中的語法地位，得到許多獨到的發現。朱先生先後參加了江陵望山楚墓竹簡、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和湖南馬王堆帛書的整理研究工作，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朱先生還十分重視中學語文教育和對外漢語教學工作，在語文教育、寫作和修辭等方面著述豐富，影響深廣。在教書育人、培養語言學人材方面，朱先生更是嘔心瀝血，幾十年如一日，辛苦耕耘。

1990年8月召開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時，朱先生曾回國作短期的逗留。有一天朱先生打電話約我到他家裏，當時找他的電話很多，我不好意思久談，坐了一會兒就告辭走了。誰知這竟是最後一面！

1981年秋我接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的錄取通知書後，父親和他的一位朋友告訴我：中文系的王力先生和朱德熙先生都是在語言研究上很有造詣的名家。那時，我感興趣的是歷史和考古專業，並不知道語言學為何物，也不知道這兩位先生到底如何，不過，兩位先生的名字我都記在腦子裏了。等上了北大以後，我纔暗暗感到驚訝，在偏僻的閩西山村裏，朱先生竟也為人所知，真所謂公論在野人也。

在本科的四年中，我聽朱先生的課不多，留在記憶中的一次是上寫作課的老師請朱先生評改一段介紹龐貝古城的文字，另一次是在一個階梯大教室裏舉行的語言學講座。朱先生講課的節奏不快不慢，言語不多而總是切中要害，臉上永遠掛着一絲和藹的笑容，而同學們也總是以會心的笑聲回答先生講課的每一詼諧生動之處。同學們都說，聽朱先生的課簡直就是一種莫大的享受。做了研究生後，纔總算有機會系統地聽朱先生的語法研究課。這門課朱先生已經講過多輪，但由於各種會議和公務的衝擊，每一輪都不能按計劃講完，有時甚至祇能講計劃的一半。一年下來後，這門課結束了，仍是沒有按計劃講完。不過值得我們慶幸的是，這輪課是講的內容最多的一次。

我第一次到朱先生家是1986年春節的前幾天。張敏君（後來是朱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請我替他送一本書送還朱先生，記得是Christoph Harbsmeier寫的一本古漢語著作。我按著門牌號來到朱先生家門口時，從屋裏傳出了悅耳的笛聲，這使我駐足了一會纔鼓起勇氣按響門鈴。朱先生在書房裏和我見面，書房裏除了寫字檯和沙發外，是幾個裝滿了書的書櫃，一盆吊蘭從書櫃頂上向下伸展著長長的翠綠枝葉。談話的時間

不長，但我卻不感到絲毫的拘束，先生溫柔敦厚的長者風度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後來我向別人打聽，纔知道原來先生喜歡唱昆曲，而且有相當高的造詣。



朱先生在學問上非常執著認真，這是跟他為人隨和截然相反的一面。朱先生做研究不僅在語料的搜集著力甚勤，而且對於語料的使用十分謹慎。對於自己認為正確的觀點，朱先生決不輕易改變，因此也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議。我以為，一位學者能在各種情況下都堅持自己的觀點並非易事。重要的是，朱先生對於語言事實總是十分尊重，從不掩飾。1988年夏，我寫了一篇文章請朱先生看，題為《新泉話的「的」字和轉指、自指標記》。文章既不同意朱先生關於北京話「的₃」的分析以及在「的₃」基礎上分出「的₃」(自指標記)和「的₄」(轉指標記)，也不同意朱先生對漢語有自指的論述。文章是托沈培君轉交的，文章送出後我就感到十分後悔，覺得非闖禍不可。沒過多長時間，朱先生就打來電話約我到他家裏面談。我是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叩開朱先生的門的，我完全沒有想到談話竟然進行得非常輕鬆愉快。朱先生說：「看得出來，你下了一番功夫，但描寫事實還不夠細，有些地方話說得不夠清楚。關鍵是要把新泉話的『的₄』[ə.1]說清楚。」請注意新泉話存在「的₄」正是不支持朱先生對北京話「的₃」分析的地方。最後，朱先生希望我10月22日能在他的語法研究課上把這篇文章的內容給同學們講一次，並在11月12日討論一次。朱先生還希望在講之前能整理出一份講稿，讓他過目一下。講稿很快就寫出來了，有了上一次吃後悔藥的教訓，這一次我把原來針鋒相對的文字一律隱去了。講稿寄出後，朱先生又打來電話，要我在講課的前一天到他家去一趟。見面後，朱先生問了一些有疑問的地方，然後問：「你不同意我的觀點，為甚麼不直說？繞來繞去，把人都繞糊塗了。你認為『的』字應該四分，可以直接了當地提出來嘛。你這個講稿倒不如你原先的文章好了。」朱先生的這番話使我徹底打消了顧慮，在第二天講課時也就完全放開了講，並在第二次課裏跟同學們認真討論。我至今覺得，這兩次課與其說我是主講，不如說我是學生，因為朱先生以一位學者的品德深深地教育了我。到了12月的一天，朱先生又把我找到家裏，說我的文章可以發表，不過論題不可太多，先把新泉話的「的」字說清楚，描寫要充分細緻一些。朱先生還說，「的」的分合問題和轉指、自指的問題我有不同看法，等我覺得成熟後也可以另寫文章發表出來。我遵囑對文章進行了刪改，就是發在《方言》1989年第1期上的《連城(新泉)話相當於北京話「的」字的語法成分》。

大凡爲文治學，有以才氣著稱於世，有以推敲苦吟爲人所知，而朱先生大概是屬於天才加苦學的那種類型。朱先生有極高的天分，而且極爲勤奮。朱先生的女兒朱眉女士告訴我，從小到大對父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總見父親趴在桌上寫啊寫啊，看啊看啊，父親的體質那麼好，他完全是累壞的！朱先生曾經在課上跟我們說，寫論文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他每寫完一篇論文，幾乎都要大病一場。朱先生對待學問的刻苦和一絲不苟，可見一斑。朱先生有一次跟我談到，做學問要有清代學者的樸學精神，而且不要太計較名利。當年（指文革期間）他跟裘錫圭一起研究古文字，在當時情況下，可以說是既無名也無利，有時甚至連發表文章也不能署名，但他們一直堅持下來。現在回想起來，那段生活居然還十分令人留戀。

朱先生做學問認真，做人更認真。1989年12月，「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在新加坡舉行，朱先生是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會議的李永明（湖南湘潭大學）請求朱先生爲《長沙方言》（湖南出版社，1991年）題簽，朱先生欣然應允；但寫好之後，朱先生自己感到不滿意，表示到美國後，再寄個好的來。不久，李永明果然接到了從美國寄來的另一個題簽。李永明跟我提及此事時，心情十分激動。如今，這兩個題簽分別用在封面和內封，可惜，可惜朱先生已經看不到了。1991年5月，我決定申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現改名爲中華社科基金），以便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得到一定的時間和經費保證。申請截止日期是7月10日。這樣的申請，按慣例需要有兩位研究員級別的人員推薦。我做的工作朱先生最爲了解，可是當時朱先生遠隔重洋，工作很忙，身體不很好，所以我祇是抱着試一試的心情給朱先生寫了一封信，請他推薦。信是5月6日發出的，不到一個月，我就收到了朱先生的回信。朱先生在信裏說：「推薦表抄寫好附上。……因爲做了白內障手術，視力甚差，書不成字，乞諒。」回信的時間是5月17日，可以想見，朱先生是一接到我的信就動筆寫這封回信的。讀著朱先生的推薦意見，我真是不知道該說甚麼好。現在，我申請的課題已獲批准，各項調查研究工作正在按計劃展開。我一定努力完成好這個課題，以告慰朱先生於九泉之下。